

圖書館人員風險認知對其創新政策態度之 影響：臺灣閱讀起步走之個案分析¹

許耿銘*、孫同文**

摘要

創新政策的擴散通常可區分為外部和內部因素的影響。對於閱讀起步走政策擴散的外部因素研究，目前國內多是從幼兒教育的觀點出發，並論及其對於嬰幼兒的學習效果；相對地，鮮見由內部因素分析閱讀起步走政策的擴散。其次，特定制度或許可以被刻意引進或設計，但要順利運作，則必須與既存的制度協調及搭配，並在利害關係人的策略性互動下，透過某些集體或社會抉擇機制不斷進行調整。因此，臺灣閱讀起步走政策的成效，亦取決於圖書館館長或承辦人員對於該政策的態度。甚且，由於創新的、首度施行的政策，執行者必須承擔較高的不確定性及創新失敗之風險。因此，研究者運用本團隊於2016年10月間，以電話問卷訪談曾經或現正執行閱讀起步走政策之360位圖書館館長或主要業務承辦人，希冀瞭解其在面對此政策時之風險感知，是否會影響其看待創新政策之態度。

關鍵詞：風險認知、創新政策態度、閱讀起步走

¹ 本研究部分初稿內容曾發表於2017年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年會暨「公共行政的創新與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研究者感謝評論人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黃東益教授提供之寶貴修正意見。

*（通訊作者），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

投稿日期：2019年7月26日；採用日期：2020年2月27日

doi:10.3966/2311505X2020020701003

Risk Perception of Librarians on the Innovative Policy: A Case Study of the Bookstart Programme in Taiwan

Keng-Ming Hsu^{*}, Milan Tung-Wen Sun^{**}

Abstract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ve policy can be divided into external and internal ones. In recent years, taking Bookstart program as an example, there have seen a wealth of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es of the external factors on policy diffusion. However, these researches usually a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to examine the impacts of the program on the learning effect of the infants and children.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analyzing its internal factors. Moreover, any specific institution can be intentionally introduced or designed, but to be effective, it must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 and make necessary adjustments through collective or social choice mechanism under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of stakeholders. Thus, the diffusion of Bookstart in Taiwan also depends on the attitudes of the library directors and librarians. Furthermore, to implement an innovative policy have to face very high uncertainties and to take risks from innovation failure because the policy is new and innova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s risk perception on the diffusion of the program, this study conducted a telephone survey of 360 library directors and librarians who have experience in promoting Bookstart in October 2016. Data analysis and research results a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and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risk perception, attitude of innovative policy, Bookstart

*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Taipei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doi:10.3966/2311505X2020020701003

壹、前言

自 1980 年代新政府運動以來，其所提倡具有創新、冒險的「公共企業家精神」(public entrepreneurship)，在各國進行改革過程中，即被學界與實務界作為改革基礎，期望體現政府能師法企業富有創新精神(蕭全政，1998；Doig & Hargrove, 1987; Drucker, 1985)。Osborne 與 Gaebler (1993，頁 31-33) 在《新政府運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 The Five Strategies for Reinventing Government*) 中使用「企業性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 一詞，描述各地正萌芽發展的新政府模式，其原意不只運用在私人企業，亦適用在公部門上；「企業家精神」應是時時運用新方法與資源，藉此提升組織效率與效能，政府體系應為具備創新精神的組織。Schumpeter (1962) 亦強調企業家精神之核心內涵，包括創新 (innovation) 和冒險 (risk-taking)，政府機關應將優秀的創新政策擴散至相關單位，俾利提升政府整體之效能，進而使國家具有競爭力(陳啟光、陳玉真、于長禧、蔡政和，2006，頁 330)。

黃東益 (2004，頁 139) 認為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其所帶來時空壓縮、資訊充足及互動頻繁的影響下，讓府際之間產生政策制定新模式，包括經驗吸取 (lesson-drawing)、政策學習 (policy learning)、標竿學習 (benchmarking) 或政策擴散 (policy diffusion) 等，使得政策創新的可能性加大。這類創新政策有其實務上應用的優勢，包括藉由其他成功的政策經驗提升本身的能力，且能降低犯錯的機率，以及因本身的規劃或經費不足，運用已有的創新政策經驗亦較為容易(柯于璋，2012)。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以下簡稱 Bookstart) 運動，是由英國公益組織圖書信託基金會 (BookTrust) 於 1992 年發起，透過免費贈書給育有嬰幼兒的家庭，提倡讓嬰幼兒提早接觸閱讀，且後續追蹤曾參與 Bookstart 接觸閱讀的幼兒，發現其在上小學後學習成效良好。原臺中縣沙鹿鎮深波圖書館於 2003 年率先推動 Bookstart 運動(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3)，係臺灣執行 Bookstart 政策的首例。

在 Bookstart 政策的發展過程中，涉及政府不同部門或組織的政策創新與擴散過程，其從英國擴展到國內，繼之從原臺中縣到中央、再擴散到其他縣市，過程中需要蒐集、整理與選擇許多不同的政策資訊(柯于璋，2016，頁 36)。此項創新政策透過資訊的溝通、交流、利用(英國圖書信託基金會、原臺中縣沙鹿鎮深波圖書館、信誼基金會)，以及在社會系統藉著不同參與者間的溝通管

道，產生創新學習與擴散的現象（原臺中縣政府、沙鹿鎮與神岡鄉圖書館），最後此項創新政策終得到廣泛的推廣（教育部與其他縣市政府）（柯于璋，2014，頁5）。

Bookstart 政策在我國雖然從 2003 年實施迄今，但針對此政策所進行的研究卻相當有限，研究主題大致分為家庭與嬰幼兒閱讀行為、圖書館服務品質、公私協力、政策執行成效評估、政策擴散與學習等，較偏重於探究組織外部之因素；相對較少以圖書館人員的角度（圖書館館長或承辦人員）等內部因素予以研究，目前國內以此為研究主題者，僅有孫同文與許耿銘（2014）、Hsu 與 Sun（2014），以及 Sun、Shih、Hsu 與 Chen（2013）以公共服務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分析公務人員的態度，以及柯于璋（2014，2016）從知識管理途徑探討此項政策的創新與擴散。

一旦引進創新政策，日後若要順利運作，不但需與既存之制度相互協調，且應透過集體社會不斷調整，更取決於執行者對於政策之態度，方能有良好的政策成效。甚且，創新或首度施行的政策，執行者須承擔較高的不確定風險，並極有可能面臨失敗的結果。惟因對於臺灣的圖書館人員而言，在此之前並未執行過 Bookstart 政策，因此可將其界定為創新政策；且在現有國內外文獻之中，相對較少同時論述公部門中的個人風險感知與創新政策態度的研究。因此，本文希冀透過 Bookstart 之個案，瞭解圖書館人員在面對此政策時的風險認知是否影響其對於創新政策之態度，期望能將此研究結果運用至其他公共事務主題，並提出相關創新政策之建議。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希冀藉由 Bookstart 個案，探討圖書館人員面對政策時的風險認知，是否會影響其對於創新政策的態度。因政策成效之背後常取決於執行人員的認知，且由於 Bookstart 被視為一項創新政策，其具備的創新特性使得政策執行者須承擔較高的不確定性風險，甚至可能面臨失敗之後果。因此，本節將首先介紹 Bookstart 政策之發展歷程，其次介紹創新政策之內涵，最後探討在面對此一創新政策時，圖書館人員可能產生的風險認知。

一、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現今社會環境的變化，父母時常得忙於工作，容易忽視孩子從小的閱讀習慣，加上近年來少子化的趨勢，家長對於兒童的教育更加重視，因此如能在小孩成長階段，父母即能與孩童一同閱讀享受共讀之樂，並藉此培養親子之間良好的互動關係，不僅能為孩子的閱讀和思考能力奠定基礎，亦能幫助他們透過閱讀故事來認識世界。

1992年英國圖書信託基金會、伯明罕大學（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教育學院及伯明罕的衛生機構和圖書館共同推動 Bookstart 運動，期望新生父母可以在孩子出生不久即一起閱讀。首次參與的 300 個家庭，由伯明罕的保健人員針對其七到九個月嬰兒進行健康檢查時，贈送內含免費童書的禮物袋。繼之，伯明罕大學追蹤這些嬰兒日後的表現，研究結果發現這些孩童的家庭，全家人對閱讀的興趣、親子共讀的頻率、去圖書館的次數皆有增加之趨勢，並且這些孩童在上小學後，其語文程度及算術能力也優於其他小孩，使得英國有愈來愈多的地方政府加入 Bookstart 計畫（天下雜誌編輯部，2012）。

原臺中縣沙鹿鎮深波圖書館陳錫冬館長在閱讀《天下雜誌》時，得知英國的 Bookstart 閱讀運動，並於 2003 年搭配當時文化建設委員會（現為文化部）所推動的「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藉由該計畫申請「閱讀起跑線」活動，隔年臺中縣文化局為平衡各區資源，選定神岡鄉和太平市圖書館辦理 Bookstart 計畫。2005 年由信誼基金會與英國 Booktrust 組織正式締結合作關係，我國因此正式成為跨國性 Bookstart 工作夥伴，且在原臺中縣文化局的支持與補助及信誼基金會的努力之下，於 2008 年在原臺中縣全部 21 個鄉鎮市展開 Bookstart 計畫，之後各縣市圖書館也陸續跟進。2009 年教育部將「閱讀起步走 0～3 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列為「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補助專案計畫」的子計畫之一，將此項政策由上而下遍及全臺灣各縣市政府（柯于璋，2014，頁 6）。

於 2009～2015 年之間，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公立圖書館執行 Bookstart 計畫的館數，較 2009 年成長逾 400%；購置 Bookstart 閱讀禮袋經費於 2015 年亦超過 2,000 萬元；而補助辦理相關活動經費將近 3,700 萬元，領取閱讀禮袋數量及相關嬰幼兒推廣活動的人次，皆大幅提升（國立臺灣圖書館，2016）。由此可見，於逐年推動下有愈來愈多的圖書館加入 Bookstart 計畫，此一政策有良好之成效，且受到嬰幼兒家長的喜愛。

由此可知，Bookstart 的計畫過程中，涉及政策擴散與創新，例如：於創新政策的初始階段，由原臺中縣沙鹿鎮深波圖書館陳錫冬館長提出，得知英國 Bookstart 活動的相關訊息，而後因此項創新政策成效良好，促使原臺中縣文化局將其擴散到原臺中縣的部分鄉鎮市；繼之透過公私協力的模式，陸續擴展到原臺中縣所有鄉鎮和其他縣市的鄉鎮圖書館；進而引發教育部的關注，將其納為全國性政策。惟在此創新政策的執行過程中，臺灣 Bookstart 政策的成效取決於圖書館館長或主要業務承辦人員對於該政策的態度，乃是討論創新政策時不可忽略之環節，亦為本研究欲探討之重點。

二、創新政策態度

創新通常被定義為一個新的想法，這種認知的產生是在想法出現之後和決定被採納或抵制之後；創新不只包括新知識，有些人可能早已經知道某個創新想法，卻沒有對此產生任何態度，甚至沒有採納或抵制它（Gray, 1973, p. 1174; Rogers, 2003）。Veryzer（1998）則將創新分為連續性創新與不連續性創新，前者指創新是連續性的進化，後者則被認為是大變革。彭俊亨、吳政峰與王俊元（2010，頁 109）認為就其本質來界定，任何不同於舊有的思考、策略、過程，只要能將現有資源賦予新的利用行為都可稱為創新。

在全球化、資訊科技進步的發展下打破時空限制，全球治理下的政府機關透過交流、學習、分享等方式，提高採納創新政策的可能性。類似概念的名詞也層出不窮，如政策移植（policy transfer）（Dolowitz & Marsh, 1996, 2000）、經驗吸取（Rose, 1991, 1993）、政策趨同（policy convergence）（Bennett, 1991）、政策學習（Bennett & Howlett, 1992）、政策擴散（Majone, 1991; Rogers, 2003）等。雖然在學界已有更細緻的區分，但本研究主要強調決策者對某一創新政策之態度，因此，儘管這些概念名詞有不同的論述內涵，然皆共同涉及「在某一個特定時間或空間的政策、行政安排、制度等，被借用來發展另一時空的政策、行政安排或制度」（Dolowitz & Marsh, 1996）。

當今較多與創新政策相關的文獻，將焦點放在政策移植、政策學習、經驗吸取、政策擴散等屬於政策本質的面向（Bennett, 1991; Bennett & Howlett, 1992; Dolowitz & Marsh, 1996, 2000; Majone, 1991; Rogers, 2003; Rose, 1991, 1993）；或因應現代科技發達需使用創新科技、技術、知識管理或產業等面向上（李仲彬，2010；錢思敏，2016；顏怡音、李芎瑩，2013）。但在政策執行後，政府內

部的執行政策人員本身對於創新政策的態度研究卻付之闕如，亦較少透過實證的方式探討創新政策。

Tang (1998) 認為影響創新的因素，包括「外部環境」(external environments) 與「內部環境」(internal environments)。外部環境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因素；內部環境則包括組織結構、資源、組織文化等，其中亦隱含問題的不確定性。相關研究在探討影響創新政策的因素時，大多使用 Rogers (1962) 提出的創新擴散理論。創新是回應環境快速變化時重要的能力之一，但公私部門在推動創新事物上，無論是阻礙性與考量的因素皆存有許多差異。原因在於執行政策人員得依法行政，導致行政程序較為繁雜，且個人的風險規避亦較高，使得創新量明顯不足 (李仲彬，2016，頁 2；Borins, 2002)。雖然學界較少探究以風險認知對創新政策態度之影響，惟研究者認為實務上執行創新政策時，應將風險認知納入重要的考量因素。

例如，Sheth (1981) 認為風險認知是創新抵制的主要因素，有心理或績效不確定性等風險型態，但其不是唯一影響人們對於創新政策態度之因素，即使沒有風險的介入，人們也有可能會因過往的習慣而抵制對現狀的改變。因此，Sheth 根據對於改變習慣的接受度高低與風險感知的高低建構模型，將創新抵制分為雙重抵制創新 (dual resistance innovations)、習慣抵制創新 (habit resistance innovation)、風險抵制創新 (risk resistance innovation) 及無抵制創新 (non-resistance innovation) 四類，其中，風險抵制創新係指當面對風險認知高，但因必須接受新的習慣而驅使其產生抵制行為。

Berry 與 Berry (2007, p. 223) 認為，雖然大多數政府的公共政策屬於漸進式的 (incremental)，意即略微修正既有政策，然而追溯源頭發現，公共政策幾乎都是非漸進式的創新。Stone 與 Madigan (2009) 將政策擴散視為「政策創新」(policy innovation)，意指特定政府單位 (如聯邦、州、地方等) 採納創新政策，而創新政策通常被定義為訂立法規。本研究之所以選定 Bookstart 作為研究個案，主要是因為對於政府人員而言，即使知悉該項政策過去在國外的發展歷程，但從未在臺灣普遍性的推行，因此對於圖書館人員可謂為創新政策。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探討 Bookstart 政策於各縣市圖書館執行時其內部因素之影響，並從執行者 (圖書館館長或主要業務承辦人) 之角度分析，近年來在民眾愈重視政府的公共服務下，圖書館人員自身對於創新政策的風險認知，是否會影響其面對創新政策的態度，希冀能將此觀察擴展到相關公共事務上之討論，並提供實務上的建議。

三、風險認知

風險認知相關的研究，向來皆以心理學為基礎，並受到學界的關注而發展出測量風險認知的量表，藉此觀察面對不同風險種類的態度（Slovic, Fischhoff, & Lichtenstein, 1982, p. 84）。例如，Baird 與 Thomas（1985）從策略模型探討環境、工業及組織決策者的風險認知，並認為風險認知是個人對外在環境的不確定而出現的心理態度，藉此評估機率與可控制程度。風險認知建構在社會系統上，並會表現在個人與環境互動的過程當中，因此，風險認知會因人而異，由此可判斷風險認知程度與發展管理風險的行為策略（朱瑞玲、楊淑雯，2013，頁 95；Vandermoere, 2008）。

Jacoby 與 Kaplan（1972）將風險認知分為五大類，包括：（一）財務風險（financial risk）：財政方面上的風險，需考慮其成本花費等；（二）績效風險（performance risk）：是否出現預期的表現，於此同時個人本身需負擔的風險；（三）心理風險（psychological risk）：出現在個體身上且因人而異，尤其無法達到預期的水準時，可能導致自我認知的心理傷害；（四）身體風險（physical risk）：產生對個人身體上的物理性傷害；（五）社會風險（social risk）：因人與群體建構在社會系統上，故行為時伴隨著是否受到別人認同的壓力。

此外，Ram（1987）曾提出創新抵制（innovation resistance）的概念，且對於行為者而言是一項正常的反應。此種現象與個人對感受到的威脅有關，如果感受到的劣勢愈高，愈容易產生對創新的抵制。創新抵制的議題，目前主要運用於消費者的研究，探析影響創新抵制之因素，大多與消費者本身、使用產品上及因自身認知其所產生的風險有密切關係（陳協勝、簡佑丞，2011，頁 29）。然而，研究者認為由此系絡，亦可將其延伸至公共政策上之討論，執行政策人員在面對創新的、首度施行的政策時，必然需承擔一定程度之風險，因此，創新政策的執行者與決策者對於政策的態度及衍生之風險認知有相當大的關聯。

四、風險認知與政策創新態度

關於討論風險與政策創新的公共事務文獻，如 Brown（2010）、Brown 與 Osborne（2013）、Flemig、Osborne 與 Kinder（2016）、Torugsa 與 Arundel（2017），以下分別予以說明。

Brown（2010）以英國的社工服務為例，討論風險與創新之間的關係，其認為風險是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創新則被視為改善公共服務的關鍵。而風險、

創新和效率之間的關係，對於理解和管理社會工作環境中的創新過程而言至關重要。根據政策研究的相關文獻，建議說服地方政府藉由績效指標進行創新。誠如 Hood、Rothstein 與 Baldwin（2001）認為有必要為公共部門風險管理制定標準，以抵銷公共部門組織採取創新精神時的矛盾壓力。由此可知，風險是任何創新過程容易出現的狀況，卻可能導致資源利用不足。儘管政府已經意識到管理風險的必要性，但仍需發展研究與資源，以充分支持這一個管理過程。政府沒有提供足夠複雜的風險管理策略，致使未能支持創新的機制。政府必須明確意識到創新所涉及的風險，並且做好準備讓地方當局和非營利組織可以承擔因創新所帶來的風險。

根據 Brown 與 Osborne（2013）的研究發現，在現有文獻中，相對較少檢視不同類型的創新、風險的類型和程度，以及適當的風險管理策略之間的關係。例如，某些激進的創新是否要求個人採取更大程度的變革，而產生更為嚴重的風險？是否有簡單、有效的技術創新，而不需要複雜的風險管理方法？儘管無法提出風險類型與創新類型之間的簡單關聯，但是有可能澄清在創新過程中可能出現風險的環節。因此，兩位學者針對風險與治理的研究，提出五項命題，其重點包括：（一）公共組織需運用兼具開放、自然與封閉系統的三種風險方法；（二）當前的公共服務風險管理方法，並未能發揮其應有之目的；（三）一個用於處理公共服務中風險和創新的框架，必須在決策過程中考慮任何既存風險的效益和危險之必要性；（四）風險治理是理解公共服務創新風險的適當框架；（五）三種應對公共服務創新風險的模式，分別是：1. 基於技術專家決策的風險最小化模式；2. 基於決策主義式的風險分析模式；3. 基於透明風險治理的風險協商模式。此外，Brown 與 Osborne 認為由於風險來源對於考慮如何進行治理至關重要，因此有必要確認公共服務創新所涉及的風險類型。

Flemig 等人（2016）於檢視相關文獻之後，修改 Brown 與 Osborne（2013）所建構的風險和公共服務創新框架，並加入硬性和軟性兩種不同類型的風險管理方法，重新提出一個修訂版的框架。其中，硬性風險管理包括技術專家和法規驅動的風險管理，適合運用於已知和受約束的風險，並為漸進式創新提供可能性的協助，但可能阻止公共組織採用創新替代方案，而採用遵循現有規則和法規的傳統方案。因此，軟性風險管理方法被認為是管理公共服務不確定性的成功方法，能引導公共組織文化繁榮發展，並促進公共服務範疇的全面創新。但是，這取決於整個公共組織的成功溝通和聯合決策系統。對於公共組織而言，此應該是最後的風險策略，能為組織和服務對象帶來極佳效益。同時，由

於對新興計畫的未來資金或創新服務的效果可能存在不確定，Flemig 等人認為其所提出的整體框架允許風險和不確定性並存，並指出該框架為解決該問題而設計的適當策略。

Torugsa 與 Arundel (2017) 主張，應結合協力、互補流程和溝通創新的策略，以及支持創新的積極管理策略，透過新穎的創新服務並規避風險，以期獲得組織收益。為了達到前述目的，可以採取以下兩種思維：(一) 如果管理人員可以實施使其有效管理和應對風險的策略，則不應將規避風險的文化視為阻礙創新成功的因素；(二) 應鼓勵具有風險意識的文化，而風險管理被視為組織創新活動與決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是克服成功障礙的重要工具。

若進一步加以檢視，Brown (2010) 主要關注於社工服務，Brown 與 Osborne (2013)、Flemig 等人 (2016)、Torugsa 與 Arundel (2017) 則是從組織面向討論，與本研究希冀採取個人風險感知與其創新政策態度有所不同。若再檢視非公共事務之文獻，則可概分為組織文化 (Townsend, 2013)、農業技術 (Ayinde, Muchie, Olatinwo, Adenuga, & Oyewole, 2014; Ho & Xue, 2008; Osbahr, Dorward, Stern, & Cooper, 2011)、科技技術 (Boyd et al., 2013; Gao, Leichter, & Wei, 2012; Hall, Bachor, & Matos, 2014; Jin & Morikawa, 2017; Paluch & Wunderlich, 2016)，以及民眾對於風險管理創新的看法 (Liu et al., 2016)。

以現有國內文獻，同時考量風險與創新之議題，可以區分為以下幾個類別，包括：金融管理 (王嗣理，2006；吳聰浩、林炯堃，2000；李仁傑、林達榮，2015；周恆志，2002；洪祥洋，1995；高銘輝，2017；陳明琪、張有中、林逾先，2009；陳溢茂，2004；陳慰星，2002；董珮真，2006；蔡慧芳，2010)、科技技術 (林炳中，2001；劉仁傑、巫茂熾，2003；鄭明淵等，2014；簡鴻儒、溫善政、張詩淳，2011)、商業行銷 (于文正、黃雲龍，2008；吳淑鶯、陳燕柔，2012)、國家治理 (周桂田，2013)、觀光旅遊 (張淑青，2010)、組織領導 (陳義勝、黃素玫、林政村，2007)。

由此可知，在現有國內外文獻之中，同時論述公部門中的個人風險感知與創新政策態度的研究相對少見。職是之故，研究者嘗試以 Jacoby 與 Kaplan (1972) 所提出之風險認知項目，檢視本研究的創新政策個案。以下將分由財務、績效、心理與社會等面向，分別說明於 Bookstart 政策中，可能會造成圖書館人員出現風險認知之實存狀況。

（一）財務風險

創新的成本愈高，會擔心在經濟與財務面向上的風險意識就愈高（Ram & Sheth, 1989, p. 8）。主要是由於創新的政策，採納者必須面對較高的不確定性與可能失敗之風險，如果有較為寬裕的資源、經費或財務，較能因應創新失敗後所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因此，財務能力將成為是否願意嘗試創新政策的關鍵之一（Rogers, 2003）。甚且，倘若能降低創新政策可能失敗的成本和風險，政策採納者會有更多發展可能性，而可能設計出更為妥適的創新方案（陳序廷、黃東益，2011，頁 104）。故而，即使真的提升政策採納者對創新的態度與知識能力，但因受制於如預算等財務問題，仍無法產生效果（李仲彬，2018，頁 27）。

因 Bookstart 政策將涉及經費問題，如同 Bookstart 政策在英國推動之初，一直存在著經費不足的財政壓力，透過許多方法才得以克服（陳永昌，2006）；而我國教育部給予圖書館辦理 Bookstart 活動的補助經費，是否會有類似的問題，致使可能影響圖書館館長或主要業務承辦人員存有財政風險，而改變其執行政策之態度。

臺灣自 2003 年由沙鹿深波圖書館引進，當時由臺中縣政府文化局負責編列補助預算，從深波圖書館鄰近區選擇 50 位嬰幼兒家庭開始推廣；2006 年之後由臺中各鄉鎮圖書館先自行編列預算，臺中縣政府文化局改以計畫案申請經費方式給予圖書館經費，最高 20 萬元。但是誠如長期協助推動 Bookstart 活動的信誼基金會（2019）即表示，很多社區圖書館或縣市常因經費不足之故，致使影響續辦或承辦意願。

（二）績效風險

績效風險，是由於績效不確定性所造成的。政策採納者會擔心該項創新政策可能尚未經過全面測試，沒有前例可循，因此可能擔心無法正常執行或不確定執行績效（Ram & Sheth, 1989, p. 8）。對於無法進行測試的創新政策，政策採納者會希望等該項政策能得到充分證明之後再予以執行（Ram, 1987, p. 210）。若以 Anderson、Potočnik 與 Zhou（2014）的觀點，其發現當今人力資源管理的眾多措施，其目標之一即為以績效為基礎的任務目標，不但強調個人學習成長，也重視個人與組織的績效成長。

根據「Bookstart 活動前置作業計畫書」之內容，每年必須將計畫執行之

成果及照片彙整為成果手冊，與經費收支表一併送教育部核結（國立臺灣圖書館，2019）。獲得補助的圖書館人員，有其執行績效上之壓力，包括禮袋發放數量、相關推廣活動之民眾參與度、民眾需求或反應等，可能使執行者產生績效風險（陳麗君、林麗娟，2014，頁63）。2009年，由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的鄉鎮圖書館，其補助標準即為績效表現最好的前6所（潘競恒，2016，頁55）。因此，各圖書館對於執行 Bookstart 活動的績效較之前更為重視。

（三）心理風險

由於人們初始的心理觀點會影響其對於後續訊息的詮釋，並且不太容易改變，因此不同人會存有不同的風險態度（Slovic, 1987）。而無論是 Amabile（1996, p. 22）認為內在心理的「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s），Anderson 等人（2014）關注正負面情緒與工作滿意度的「個人的心理狀態」（psychological states），Standing 等人（2016）歸納包括心理面向的個人特質，以及李仲彬（2018，頁14）論及人員個體層次的內在心理素質，都會對於創新態度與行為造成影響。甚且，如 Damanpour（1991）、Tornatzky 與 Klein（1982）、Walker（1969）所歸納出影響創新之因素，於人員層面主要聚焦於其本身的心理認知。因此，人員的心理特徵與信念將會影響創新的抵制及接納（Ram, 1987, pp. 210-211; Ram & Sheth, 1989, p. 7）。

個人本身之心理因素不盡相同，其在面對 Bookstart 政策之正負面效應，使得執行政策時心理因素有所差異，誘發其顯現可能的心理風險。例如，報名參與 Bookstart 活動的人數過多，但因圖書館員人力不足，若要全面推廣與發放，其恐將不堪負荷。因此，圖書館人員的心理態度是閱讀起步走政策成功推動的關鍵要素（陳麗君、林麗娟，2014，頁69）。

（四）社會風險

社會學者（Beck, 1992; Beck, Giddens, & Lash, 1994; Luhmann, 1993）開始重視「創新」與「社會風險」關係之探討。根據李仲彬（2018，頁13-14）及 Malik、Butt 與 Choi（2015）的研究發現，長官或同事的支持是創新的重要驅力；反之，倘若他人嘲笑、排斥或是疏離，對其則是社會風險與成本（Homans, 1961）。因此，政策採納者會相當程度考量社會影響力和社交網絡因素（Ishak & Newton, 2016, pp. 89-90; Ram & Sheth, 1989, p. 8）。

各圖書館人員會因為有無受到上級長官、同事、其他圖書館館長或主要業務

承辦人員的認同與支持，導致其出現社會風險。根據陳麗君與林麗娟（2014，頁 63）的研究發現，圖書館人員在推動 Bookstart 活動時，會擔心缺乏縣市首長、鄉鎮市區長、總館或教育、文化局（處）、館員的認同與支持。

（五）小結

由於 Bookstart 政策應當較不會出現身體上的風險，故本研究基於上述之理由，選定財務風險、績效風險、心理風險、社會風險，希冀瞭解圖書館人員面對 Bookstart 政策時，探討其風險認知對創新政策態度之影響。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根據文獻檢閱的結果，本研究參酌 Jacoby 與 Kaplan（1972）將風險認知分為五個次構面。惟因根據此個案之特性，研究者認為圖書館館長或主要業務承辦人員，可能因個人的心理因素使其顯現心理風險；再者，由於預算問題，產生財政風險；繼之，執行者擔心政策執行上的成效，而出現績效風險；最後，執行者有被認同之壓力，導致其出現社會風險。因 Bookstart 政策應不會出現身體上之傷害，故本研究將身體風險予以刪除。據此，本研究關注心理、財政、績效與社會等風險面向。綜上所述，本研究以風險認知作為自變項，創新政策態度作為依變項，探討其因果關係，茲將本研究所欲驗證之架構，繪製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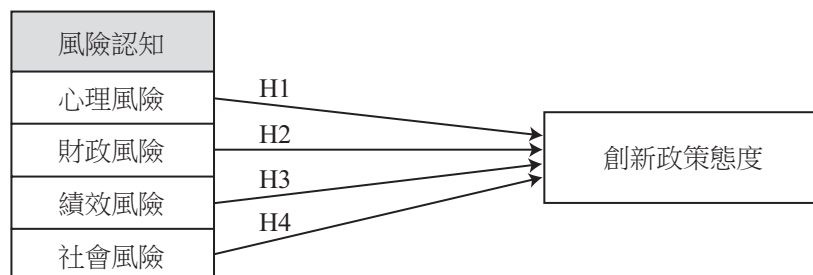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的假設，分別為：

- H1：心理風險認知對其創新政策態度有負向影響。
- H2：財政風險認知對其創新政策態度有負向影響。
- H3：績效風險認知對其創新政策態度有負向影響。
- H4：社會風險認知對其創新政策態度有負向影響。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問卷經參酌 Jacoby 與 Kaplan (1972) 風險認知及其次構面，以及與創新政策態度之相關文獻設計，並經由兩位學者協助檢視之後完成。本研究於 2016 年 10 月間，針對全臺灣 430 個公共圖書館中，以電話問卷調查曾經或現正執行 Bookstart 政策之 360 位圖書館館長或主要業務承辦人，各圖書館僅調查一位受訪者，成功完成之有效樣本為 342 份。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旨在藉由 Bookstart 政策，探討圖書館人員之風險認知與創新政策態度的關聯性。研究者以統計軟體 IBM SPSS Statistics 21.0 進行分析，並就統計分析結果加以討論，以下就各統計內容予以進一步說明。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之調查受訪人員的服務年資及負責辦理 Bookstart 活動年數，而心理、財政、績效與社會風險認知各題項之平均數及標準差，詳見表 1。

表 1
描述性摘要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人背景變數	1. 服務年資	7.33	7.547
	2. 辦理 Bookstart 活動年數	3.49	2.664
創新政策態度	1. 「閱讀起步走」帶來嶄新且有用的資訊	4.70	.792
	2. 「閱讀起步走」是容易採用且執行的	4.56	.835

表 1 (續)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3. 「閱讀起步走」有助提升本館績效	4.75	.677
	4. 「閱讀起步走」有助提升本館組織學習成效	4.63	.842
績效 風險	1. 在考慮推動創新方案時，貴館對方案績效懷抱著信心	2.45	.808
	2. 您的同事所展現的績效，將符合創新方案的目標	2.54	.880
	3. 貴館所推動的創新方案，其主要的績效指標是明確的	2.33	.716
財政 風險	1. 創新方案有助於貴館爭取更多預算	2.65	1.000
	2. 您認為創新方案可增進預算執行的效率	2.74	.967
	3. 貴館將能充分執行創新方案的預算	2.56	.971
社會 風險	1. 如果成功地推動創新方案，您的同事會以您為榮	2.56	.908
	2. 您認為在地社區能從創新方案中獲益	2.45	.784
	3. 您認為推動創新方案有助於瞭解標的團體在行為或態度上的轉變	2.38	.715
心理 風險	1. 推動創新方案會讓您在心理上感到愉快	2.48	.828
	2. 您能保持熱忱以推動創新方案	2.27	.636
	3. 您覺得創新方案是很重要的	2.27	.652
	4. 推動創新方案將使他人對您有正面的評價	2.41	.738
	5. 您會採行符合您個人特質的創新方案	2.65	1.046

二、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及信度分析，藉此評估題項間是否具有**一致性 (consistency)** 與**穩定性 (stability)** 的可靠程度。DeVellis (1991) 對 Cronbach's α 係數界定如下：當 α 係數介於 .65 ~ .70 間代表信度尚可； α 係數介於 .7 ~ .8 之間則代表具有高信度； α 係數大於 .8 信度最佳。KMO (Kaiser-Meyer-Olkin) 值之判斷原理為：當 KMO 值介於 .6 ~ .7 之間因素分析適合性普通，表示 KMO 值介於 .7 ~ .8 間，表示適中；KMO 值介於 .8 ~ .9 之間時，則代表良好；KMO 值大於 .9 以上表示極佳 (Kaiser, 1974)。

由於風險認知可分為心理、財政、績效與社會等次構面，因此，本研究之因素分析運用兩種方式予以檢測，分別為將風險認知分為心理風險、財政風險、績效風險與社會風險等次構面，進行因素與信度分析；另一則為將風險認知視為一個構面，整體檢視此構面之因素與信度分析。

根據表 2 可得知將心理風險、財政風險、績效風險與社會風險等次構面之 KMO 值為 .902，表示因素分析適合性為極佳，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4.958%。心理風險構面的衡量題項為 5 題，Cronbach's α 係數為 .815，意謂心理風險構面具有最佳信度，解釋變異量為 20.538%，各題項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5；財政風險構面的衡量題數為 3 題，Cronbach's α 係數為 .662，表示財政風險構面之信度尚可，解釋變異量為 15.664%，各題項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5；績效風險構面的衡量題數為 3 題，Cronbach's α 係數為 .710，代表績效風險此構面之信度尚可，解釋變異量為 14.765%，各題項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5；社會風險構面的衡量題數為 3 題，Cronbach's α 係數為 .665，代表社會風險構面之信度尚可，解釋變異量為 13.991%，各題項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5。

表 2
風險認知構面之因素分析與信度結果摘要

研究構面	題項	共同性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信度分析	KMO
心理風險	1. 您能保持熱忱以推動創新方案	.782	.789	20.538	.815	
	2. 您會採行符合您個人特質的創新方案	.614	.726			
	3. 推動創新方案會讓您在心理上感到愉快	.658	.669			
	4. 推動創新方案將使他人對您有正面的評價	.722	.642			
	5. 您覺得創新方案是很重要的	.636	.595			
財政風險	1. 創新方案有助於貴館爭取更多預算	.664	.789	15.664	.662	.902***
	2. 您認為創新方案可增進預算執行的效率	.652	.709			
	3. 貴館將能充分執行創新方案的預算	.495	.562			
績效風險	1. 您的同事所展現的績效，將符合創新方案的目標	.683	.795	14.765	.710	
	2. 貴館所推動的創新方案，其主要的績效指標是明確的	.672	.726			
	3. 在考慮推動創新方案時，貴館對方案績效懷抱著信心	.600	.650			
社會風險	1. 您認為在地社區能從創新方案中獲益	.755	.820	13.991	.665	
	2. 您認為推動創新方案有助於瞭解標的團體在行為或態度上的轉變	.713	.750			
	3. 如果成功地推動創新方案，您的同事會以您為榮	.448	.464			

註：累積解釋變異量 = 64.958。

*** $p < .001$

創新政策態度構面的衡量題數為 4 題，KMO 值為 .713，代表其因素分析適合性適中，Cronbach's α 係數為 .718，表示創新政策態度構面具有高信度，解釋變異量為 54.984%，各題項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5，相關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數據，詳列於表 3。

表 3

創新政策態度構面之因素分析與信度結果摘要

研究構面	題項	共同性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信度分析	KMO
創新政策態度	1. 「閱讀起步走」帶來嶄新且有用的資訊	.535	.732	54.984	.718	.713***
	2. 「閱讀起步走」是容易採用且執行的	.495	.704			
	3. 「閱讀起步走」有助提升本館績效	.676	.822			
	4. 「閱讀起步走」有助提升本館組織學習成效	.493	.702			

*** $p < .001$

三、相關性分析

檢驗相關分析之目的，首先，在於研究連續變項間之線性關係強度；其次，則是迴歸分析係建立在兩變項之間的相關性基礎上，方能進一步探究變項間之因果關係；再者，為避免日後迴歸分析時，變項間產生共線性問題，須藉由變項間的相關分析初步檢測（邱皓政，2010）。

從表 4 的相關分析表觀察發現，心理風險與財政風險相關係數絕對值為 .537；心理風險與績效風險相關係數絕對值為 .527；心理風險與社會風險相關係數絕對值為 .621；心理風險與創新政策態度相關係數絕對值為 .471；社會風險與財政風險相關係數絕對值為 .498；社會風險與績效風險相關係數絕對值為 .464；社會風險與創新政策態度相關係數絕對值為 .431；財政風險與績效風險相關係數絕對值為 .480；財政風險與創新政策態度相關係數絕對值為 .466；創新政策態度與績效風險相關係數絕對值為 .438。以上相關係數絕對值皆介於 .40 ~ .69 之間，表示各構面彼此兩者間為中度相關 ($p < .05$)，因此不會產生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表 4
相關性分析

變項名稱	服務年資	辦理 Bookstart 活動年數	心理風險	財政風險	績效風險	社會風險
辦理 Bookstart 活動年數	.506***					
心理風險	-.078	-.123*				
財政風險	-.072	-.099	.537***			
績效風險	-.127*	-.187**	.527***	.480***		
社會風險	-.130*	-.159**	.621***	.498***	.464***	
創新政策態度	.058	.152*	-.471***	-.466***	-.438***	-.431***

* $p < .05$ ** $p < .01$ *** $p < .001$

四、迴歸分析

本研究採階層迴歸分析，且為避免變項間出現線性重合問題，將以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及條件指數（conditional index, CI）檢測共線性問題。VIF 為容忍值（tolerance）的倒數，VIF 愈大表示愈有共線性問題，當 VIF 大於 5 時，自變數間有高度相關問題；VIF 大於 10 時，則共線性問題嚴重影響估計穩定性（邱皓政，2010）。CI 值愈高表示共線性問題愈嚴重，Belsley、Kuh 與 Welsch（1980）認為當 CI 值低於 30，此時共線性問題緩和；介於 30 ~ 100 間，則代表此迴歸模型中具高度共線性；高於 100 以上有嚴重共線性問題。欲驗證風險認知對創新政策是否具有影響效果，經過迴歸統計分析後，茲將統計數據及說明如下。

針對心理風險、財政風險、績效風險與社會風險對創新政策態度之影響，分析結果如表 5。此部分以創新政策態度作為依變項，首先加入控制變項（模型一），再將自變項心理風險加入（模型二），心理風險 β 值為 $-.208$ 、財政風險 β 值為 $-.217$ 與績效風險 β 值為 $-.157$ ，且達顯著水準，社會風險 β 值為 $-.117$ ，未達顯著水準，且模型一至模型二，整體調整後 R^2 從原本 $.018$ 提升到 $.305$ （ $\Delta \text{Adj-}R^2 = .287$ ），表示控制個人背景因素後，心理風險、財政風險、績效風險對創新政策態度有顯著的影響，故研究假設一至三成立；社會風險對創新政策態度無顯著影響，故研究假設四不成立，此迴歸模型之 VIF 皆小於 5，且 CI 值亦都小於 30，無共線性問題。

表 5

心理、財政、績效與社會風險對創新政策態度之影響迴歸分析

變項	創新政策態度							
	模型一				模型二			
	β	<i>t</i> 值	VIF	CI 值	β	<i>t</i> 值	VIF	CI 值
控制變項								
辦理「閱讀起步走」活動共多少年？	.147	2.337*	1.000	3.022	.049	.910	1.054	3.926
自變項								
心理風險					-.208	-2.888**	1.852	11.606
財政風險					-.217	-3.331**	1.527	12.548
績效風險					-.157	-2.430*	1.496	14.808
社會風險					-.117	-1.707	1.672	15.882
R^2		.022				.319		
Adj- R^2		.018				.305		
Δ Adj- R^2		-				.287		
<i>F</i> 值		5.460*				22.892***		
ΔF 值		-				17.432		

註：表中 β 值為標準化 β 係數。

* $p < .05$ ** $p < .01$ *** $p < .001$

經檢視標準過後的 β 值，代表圖書館人員在其心理、財政、績效風險愈高時，對創新政策愈有負面的態度，可能原因應為當個人自身心理、財政、績效風險愈高，其對於必須承擔創新政策的風險認知愈高，因此，可推論心理、財政、績效風險會對於創新政策產生負面態度。

本研究從創新政策的內部因素檢視 Bookstart 個案，並調查全臺 360 位圖書館館長或主要業務承辦人員對此政策之風險認知，並結合 Jacoby 與 Kaplan (1972) 對於風險認知分類的主張。整體而言，圖書館人員在面對創新政策時，確實會因其中之不確定性，使得其自身對於政策之風險認知（心理風險、財政風險、績效風險）態度將影響其面對創新政策態度，因此得出本研究之假設一到三皆成立，意即圖書館人員面臨創新政策之風險認知愈高時，其對於創新政策態度之負面態度亦愈高。

伍、結論與建議

在新政府運動的推波助瀾之下，各界開始重視政府的服務品質，並期待政府能師法企業並具有創新改革的精神。因此，許多政府機關開始規劃或執行相關創新政策，希望藉此獲得社會之認可，並提升政府行政運作效能，進而促使臺灣更具備創新的競爭能力。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試圖以我國 Bookstart 個案，討論圖書館人員的風險認知與面對創新政策態度之關係。

一項政策之成敗關鍵不僅在於政策規劃階段，後續的政策執行階段更是不容忽視。研究者認為圖書館人員在面對創新政策之際，其承擔的不確定性與政策失敗的風險，極有可能影響其對於創新政策之態度。根據過去對於 Bookstart 個案研究之現況而言，分析組織內部之影響因素，是值得進一步努力的主題。因此，本研究利用 Jacoby 與 Kaplan (1972) 對於風險認知分類的觀點，探析我國圖書館人員在面對如 Bookstart 之創新政策時，是否會受到其自身之風險認知所影響，希冀藉此補充學界較少討論執行政策人員本身對於創新政策態度之研究缺口。

本研究以 Bookstart 政策，針對曾經或現正執行此政策之 360 位圖書館館長或主要業務承辦人，調查其面對該政策的風險認知（包括心理風險、財政風險、績效風險、社會風險）及創新政策態度。根據研究者針對 Bookstart 個案的研究結果顯示，圖書館人員在其心理、財政、績效等風險認知，確實會影響其面對創新政策的態度。由此可知，若希望特定政策被擴散、學習、引進或設計，並希冀該政策得以順利執行的同時，如欲與既有組織和政策有良好之協調互動，期望政策之成效能符合預期目標，研究者認為必須重視執行者（圖書館人員）對於創新政策之風險認知。

再者，學界對於創新政策的研究多採取 Rogers (1962) 的創新擴散理論，且在研究者檢閱諸多文獻後，發現目前有關創新相關之研究仍屬管理學方面的研究主題居多，如創新產品、消費者購買行為或企業決策者採取創新科技之文獻，但反觀公共事務領域，較少有關執行政策人員的風險認知與創新政策的文獻，此為日後研究可再琢磨之處。如未來能從更多面向與主題探討創新政策，將可更完整地建構此主題範疇。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于文正、黃雲龍（2008）。當創意人轉型為創業家——1億2千萬的一門課：創新需要風險管理。《產業管理評論》，2（2），39-49。
- 天下雜誌編輯部（2012）。人生，從父母懷中聽故事開始。《天下雜誌》，263。取自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0911>
- 王嗣理（2006）。大陸投資風險管理研討會——前進大陸開創新藍海策略。《電工資訊雜誌》，188，64-67。
- 朱瑞玲、楊淑雯（2013）。臺灣民眾的利環境態度與行為：價值觀與罪感的影響。《環境教育研究》，9（2），91-129。
- 吳淑鶯、陳燕柔（2012）。綠色行銷認知與知覺創新對知覺品質、知覺風險及購買意願之影響。《中華管理評論》，15（3），1-26。
- 吳聰浩、林炯堃（2000）。財務風險管理創新——巨災選擇權。《華信金融季刊》，12，83-92。
- 李仁傑、林達榮（2015）。壽險業創新行銷通路新思維——聯盟風險管理理論基礎。《保險專刊》，31（3），285-300。
- 李仲彬（2010）。影響全球電子治理發展的因素：以政策擴散理論為基礎的分析。《公共行政學報》，36，39-89。
- 李仲彬（2016）。從哪來的創新想法？地方政府創新來源與創新政策特質的分析。《公共行政學報》，50，1-42。
- 李仲彬（2018）。與生俱來與後天培養：影響公務人員創新態度與行為的因素分析。《公共行政學報》，54，1-40。
- 周恆志（2002）。當代金融風險管理與金融創新。《今日合庫》，28（2），8-19。
- 周桂田（2013）。全球化風險挑戰下發展型國家之治理創新——以臺灣公民知識監督決策為分析。《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4，65-148。
- 林炳中（2001）。創新研發之風險管理——借鏡美國前瞻科技計畫。《臺灣經濟研究月刊》，24（12），102-109。
- 邱皓政（2010）。《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SPSS（PASW）資料分析範例解析（第五版）》。臺北市：五南圖書。

- 信誼基金會 (2019)。嬰幼兒閱讀推廣納入國家政策。取自 <http://www.bookstart.org.tw/p1-20.html>
- 柯于璋 (2012)。我國城市參與全球環境治理之政策移植程度比較與分析。政策與人力管理, 3 (2), 43-73。
- 柯于璋 (2014)。政策創新與擴散之政策資訊、知識應用與治理:「閱讀起步走」計畫之個案分析。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NSC101-2410-H-260-068-)。南投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柯于璋 (2016)。我國「閱讀起步走」政策創新與擴散之研究——政策知識管理的研究途徑。公共行政學報, 51, 35-67。
- 洪祥洋 (1995)。金融創新趨勢與風險管理原則。臺灣經濟金融月刊, 31 (2), 1-7。
- 孫同文、許耿銘 (2014)。公共服務動機對政策擴散之影響:「閱讀起步走」計畫之個案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NSC101-2410-H260-038-SS2)。南投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高銘輝 (2017)。互聯網金融之創新與風險。內部稽核, 96, 20-24。
- 國立臺灣圖書館 (2016)。105年「閱讀起步走 (Bookstart)」活動前置作業計畫書。取自 <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63210284517.doc>
- 國立臺灣圖書館 (2019)。108年 Bookstart 活動前置作業計畫書。取自 <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941510312314.pdf>
- 張淑青 (2010)。探索生態旅遊行為意圖的影響因素——遊客創新、風險知覺、興趣、涉入與支持度的關係。戶外遊憩研究, 23 (2), 53-77。
- 陳永昌 (2006)。給孩子一生最好的禮物——英國「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運動。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88, 33-37。
- 陳序廷、黃東益 (2011)。為什麼創新先驅成為後進者?臺北市政府的行車倒數計時顯示器政策學習過程。公共行政學報, 40, 77-110。
- 陳協勝、簡佑丞 (2011)。採用障礙與抵制型態對創新抵制影響模式之研究。朝陽商管評論, 10 (1), 21-51。
- 陳明琪、張有中、林逾先 (2009)。技術創新下不同風險型態之最適投資決策:實質選擇權與產品生命週期之應用。管理學報, 26 (5), 507-532。
- 陳啟光、陳玉真、于長禧、蔡政和 (2006)。政府機關之間為民服務創新作為擴散過程之探討。品質學報, 13 (3), 329-343。
- 陳溢茂 (2004)。金融創新與風險管理。臺灣經濟金融月刊, 40 (3), 47-54。

- 陳義勝、黃素玫、林政村 (2007)。高階主管之風險承擔與組織創新對新產品發展績效之影響。北臺灣學報，30，95-113。
- 陳慰星 (2002)。金融創新 風險防範——新的投資品種 中國存托憑證。卓越世界，215，80-83。
- 陳麗君、林麗娟 (2014)。臺灣公共圖書館推動「閱讀起步走」計畫之調查研究。圖書與資訊學刊，85，51-72。
- 彭俊亨、吳政峰、王俊元 (2010)。政策擴散下的創新治理：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之經驗與啟發。國家與社會，8，99-156。
- 黃東益 (2004)。全球治理下政府知識管理的新面向：府際政策學習。國家政策季刊，3 (1)，135-154。
- 董珮真 (2006)。「2006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自主創新興商機。電工資訊雜誌，190，8-14。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13)。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緣起。取自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BookActiveContent.aspx?id=1093&>
- 劉仁傑、巫茂熾 (2003)。中臺灣精密機械產業的資金風險分擔機制——中臺灣區域創新研究。機械工業，240，238-245。
- 潘競恒 (2016)。創新政策擴散之制度性因素：以「閱讀起步走」計畫為例。民主與治理，3 (2)，53-82。
- 蔡慧芳 (2010)。產業風險、市場創新與企業績效。吳鳳學報，18，265-277。
- 鄭明淵、邱建國、邱永芳、吳育偉、徐梓隆、吳宏興、林正軒 (2014)。創新生物共生演算法 (SOS) 在橋梁生命週期風險評估與維護策略之研究。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刊，26 (4)，293-308。
- 蕭全政 (1998)。企業家精神與新政府運動。政治科學論叢，9，363-384。
- 錢思敏 (2016)。政府創新政策之落實機制——智慧城市 PPP 模式之應用。臺灣經濟研究月刊，39 (7)，71-80。
- 簡鴻儒、溫善政、張詩淳 (2011)。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高架施工風險分析與管理——以嘉義產業創新中心為例。現代營建，384，33-41。
- 顏怡音、李芎瑩 (2013)。政府產業創新政策對企業智慧資本累積與經營績效之影響——以研發及人才培訓為例。管理與系統，20 (4)，755-791。
- Osborne, D., & Gaebler, T. (1993)。新政府運動 (劉毓玲，譯)。臺北市：天下文化。

二、外文部分

- Amabile, T. M. (1996). *Creativity in context: Update to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Anderson, N., Potočnik, K., & Zhou, J. (2014).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 A state-of-the-science review, prospective commentary, and guid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Management*, 40(5), 1297-1333.
- Ayinde, O. E., Muchie, M., Olatinwo, K. B., Adenuga, A. H., & Oyewole, A. E. (2014). Analysis of adoption and risk perception in innovation system in Kwara state Nigeria: A case study of improved r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10(2), 816-822.
- Baird, I. S., & Thomas, H. (1985). Toward a contingency model of strategic risk taking.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0(2), 230-243.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M. Ritter, Trans.). London, UK: Sage.
- Beck, U., Giddens, A., & Lash, S.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elsley, D. A., Kuh, E., & Welsch, R. E. (1980). *Regression diagnostics: Identifying influential data and sources of collinearity*.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 Bennett, C. J. (1991). What is policy convergence and what causes i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2), 215-233.
- Bennett, C. J., & Howlett, M. (1992). The lessons of learning: Reconciling theories of policy learning and policy change. *Policy Sciences*, 25(3), 275-294.
- Berry, F. S., & Berry, W. D. (2007).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models in policy research. In P. A. Sabatier (Ed.),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2nd ed., pp. 223-260).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Borins, S. (2002). 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3(8), 467-476.
- Boyd, A. D., Liu, Y., Stephens, J. C., Wilson, E. J., Pollak, M., Peterson, T. R., ... Meadowcroft, J. (2013). Controversy i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ntrasting media and expert risk perceptions of the alleged leakage at the Weyburn carbon dioxide storage demonstration proj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 Greenhouse Gas Control*, 14, 259-269.
- Brown, L. (2010). Balancing risk and innovation to improve social work practi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40, 1211-1228.
- Brown, L., & Osborne, S. P. (2013). Risk and innovation: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risk governance in public service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5(2), 186-208.
- Damanpour, F. (1991).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 meta-analysis of effects of determinants and moderato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4(3), 555-590.
- DeVellis, R. F. (1991). *Sca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Series 26). Newbury Park, CA: Sage.
- Doig, J. W., & Hargrove, E. C. (Eds.). (1987). *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 A biographical perspective on entrepreneurs in governmen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olowitz, D., & Marsh, D. (1996). Who learns what from whom: A review of the policy transfer literature. *Political Studies*, 44(2), 343-357.
- Dolowitz, D., & Marsh, D. (2000). Learning from abroad: The role of policy transfer in contemporary policy-making. *Governance*, 13(1), 5-23.
- Drucker, P. F. (1985).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and principles*. New York, NY: Harper Collins.
- Flemig, S., Osborne, S., & Kinder, T. (2016). Risky business-reconceptualizing risk and innovation in public services.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36(6), 425-432.
- Gao, T.-T., Leichter, G., & Wei, Y.-S. (2012). Countervailing effects of value and risk perceptions in manufacturers' adoption of expensive, discontinuous innovations.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41(4), 659-668.
- Gray, V. (1973). Innovation in the states: A diffusion stud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4), 1174-1185.
- Hall, J., Bachor, V., & Matos, S. (2014). The impact of stakeholder heterogeneity on risk perception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echnovation*, 34(8), 410-419.
- Ho, P., & Xue, D. (2008). Farmers' perceptions and risks of agro-bio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China: Ecological change in Bt cott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7(4), 396-417.
- Homans, G. C. (1961).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London, UK: Routledge & Kegan Paul.
- Hood, C., Rothstein, H., & Baldwin, R. (2001). *The government of risk: Understanding risk regulation regim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su, K.-M., & Sun, M. T.-W. (2014). Policy diffusion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Bookstart programme i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7(2), 179-190.
- Ishak, S. S. M., & Newton, S. (2016). An innovation resistance factor model. *Construction Economics and Building*, 16(3), 87-103.
- Jacoby, J., & Kaplan, L. B. (1972). *The components of perceived risk*. Chicago, IL: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Press.
- Jin, B., & Morikawa, S. (2017). Risk perception and innovative policy adoption: A case of e-health in Eston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7(10), 661-666.
- Kaiser, H. F. (1974). An index of factorial simplicity. *Psychometrika*, 39(1), 31-36.
- Liu, B. F., Roberts, H., Petrun Sayers, E. L., Ackerman, G., Smith, D., & Iles, I. (2016). Preparing for the worst: Public perceptions of risk management innovations.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11), 1394-1417.
- Luhmann, N. (1993).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R. Barrett, Trans.). New York, NY: A. de Gruyter.
- Majone, G. (1991). Cross-national sources of regulatory policy making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1(1), 79-106.
- Malik, M. A. R., Butt, A. N., & Choi, J. N. (2015). Rewards and employee creative performanc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reative self-efficacy, reward importance, and locus of contro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6(1), 59-74.
- Osbahr, H., Dorward, P., Stern, R., & Cooper, S. (2011). Supporting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Uganda to respond to climate risk: Linking climate change and variability with farmer perceptions. *Experimental Agriculture*, 47(2), 293-316.
- Paluch, S., & Wunderlich, N. V. (2016). Contrasting risk perceptions of technology-based service innovations in inter-organizational setting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9(7), 2424-2431.

- Ram, S. (1987). A model of innovation resistance.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4(1), 208-212.
- Ram, S., & Sheth, J. N. (1989). Consumer resistance to innovations: The marketing problem and its solutions.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6(2), 5-14.
- Rogers, E. M. (1962).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Rogers, E. M. (2003).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Rose, R. (1991). What is lesson-drawing?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1(1), 3-30.
- Rose, R. (1993). *Lesson-drawing in public policy: A guide to learning across time and space*.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 Schumpeter, J. A. (196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 Sheth, J. N. (1981). Psychology of innovation resistance: The less developed concept in diffusion research. *Research in Marketing*, 4, 273-282.
- Slovic, P. (1987). Perception of risk. *Science*, 236, 280-285.
- Slovic, P., Fischhoff, B., & Lichtenstein, S. (1982). Why study risk perception? *Risk Analysis*, 2(2), 83-93.
- Standing, C., Jackson, D., Larsen, A. C., Suseno, Y., Fulford, R., & Gengatharen, D. (2016). Enhancing individual innovation in organisation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19(1), 44-62.
- Stone, J., & Madigan, E. (2009). Policy diffusion and municipal wireless initiatives. *Perspectives in Public Affairs*, 6, 25-50.
- Sun, M. T.-W., Shih, M.-C., Hsu, K.-M., & Chen, J. (2013). Service innovation and policy diffus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Bookstart program in Taiwa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26(5), 361-374.
- Tang, H. K. (1998).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 *Technovation*, 18(5), 297-309.
- Tornatzky, L. G., & Klein, K. J. (1982). Innov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 adoption-implementation: A meta-analysis of findings.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9(1), 28-45.
- Torugsa, N., & Arundel, A. (2017). Rethinking the effect of risk aversion on the benefits of service innovation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gencies. *Research*

Policy, 46(5), 900-910.

Townsend, W. (2013). Innov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risk in the public sec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5(3), 21-34.

Vandermoere, F. (2008). Hazard perception, risk perception, and the need for decontamination by residents exposed to soil pollution: The role of sustainability and the limits of expert knowledge. *Risk Analysis*, 28(2), 387-398.

Veryzer, R. W. (1998). Dis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th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Journal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15, 304-321.

Walker, J. L. (1969).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63(3), 880-899.